

世界主要工業國面臨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

陳元

前言

自從一九七七年秋季以來，美元匯率下跌成爲世界經濟的中心問題。本刊所發表多篇有關國際經濟的論文，都論及美元問題。誠然，美元作爲世界共同的貨幣，假若價值不穩定，對於每一國家、每一企業以及每一個人所造成不利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一九七七年，美元對十種外國通貨的匯率，平均下跌五%，至於對日元、西德和瑞士法郎的匯率下跌更多。美國曾經會同強勢貨幣國家支持美元的匯率，獲得短暫的穩定。可是，到二月中旬又見波動。二月二十日，在瑞士蘇黎士市場，美元匯率數十七日紐約市價下跌三%，由一比一·八七五六瑞士法郎降爲一比一·八二二五；在富蘭克佛對馬克匯率下跌一·三%，由一比二·〇五八九馬克降爲一比二·〇三一五。在同一期間，美元對日元匯率由一比二·三九·五五降爲一比二·三九·五三；對法國法郎匯率由一比四·八二一六降爲四·七八二五；對英鎊的匯率由一·九四五〇比一降爲一·九五四〇比一。平均跌幅雖不驚人，而一直瀉落不同頭的趨勢，引起廣泛的憂慮。

西德銀行家說：「從世界經濟的觀點看，美元危機是非常危險的，美元作爲國際貿易、準備和投資通貨的任務一直的削弱，而沒有可以期待的回頭。這對於國際資本的交易也有所危害。」

瑞士的金融界人士說：「美元匯率的跌落由於美國的政策使無人願意買進美元」。又說「對於停止美元的跌價，華盛頓除了播弄口舌之外沒有別的。我們所聽到的，只是說，而不見行動。」

此時，英國財政部長奚萊洽好在布魯塞爾參加歐洲共同體財政部長會議，他說：「一般的觀點，當美國國際收支有大量逆差而其他國有大量順差的時候，美元對順差國通貨的貶值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也有一種一致的觀點，金融市場趨向於擴大了實際的經濟因素。」這談話當然是適合於奚萊的身分。

美元問題自然也不免發生政治影響。法國即將在三月舉行議會選舉。法國在野的社會黨黨魁米德蘭答覆金融週報記者的訪問中

說：「美國要對於當前的貨幣風潮負責，因為美國自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就一直採取一種『無理的金融擴張主義』的政策，反映美元作為國際準備通貨的特權地位。現在，美國將要運用他的貨幣權力來對抗他的主要貿易勁敵西德和日本。美國也還要運用同樣的特權來對付在歐洲和亞洲貿易敵手的興趣，利用浮動匯率的便利來操縱美元的平價。……」他並且說，假使他當政，將要逐漸加強國際的浮動匯率而建立一種固定但可調整的匯率制度。法國本來是堅持固定匯率制，經其他國家的折衝和多年磋商，最後才接受了美國所主張的浮動匯率制。米德蘭的談話當然是有刺激性的競選宣傳。^①

比利時出生的崔芬 (Robt Tiffin) 在耶魯大學任教，現在比利時度假，並應聘為歐洲共同體顧問。他說：只有一些在歐洲生長的人才知道美元的困難對於人們心理的衝擊。自從戰後，美元是世界的通貨，是貨幣制度的錨，是交易的媒介，例如，英國人由巴西買貨賣到比利時，都用美元。美元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他是那麼穩定而不可動搖。反過來，一旦美元變得不穩定而下跌，美國以外的人就會感覺不安全而憂慮到西方自由經濟的前途。尤其是，歐洲人常常以一個國家貨幣的強度來衡量其政治力量。當美元下跌，外國人會關切到美國作為領導者的實力和能量。崔芬感覺奇怪，似乎美國的決策者沒有看到這個危機，一直到現在，他們所採取維護美元的措施都是無力和暫時性的，似乎漫不經心的任憑美元跌價，冀其有助於美國的貿易平衡。事實上，美元跌價會加重美國的膨脹。^②

以上的評論說明了美元問題對於世界的經濟和政治發生同樣重大影響。

美國何嘗放棄維護美元的責任？維護作為世界通貨的美元，又何嘗是美國一國的責任？問題在於，維護通貨的力量必須憑藉經濟的實力。目前，自由世界三個經濟大國，被認為應當負起「火車頭」任務的美國、日本和德國，雖然經濟力量比較強大，比較健全，也都有各自的苦經。至於三國以外的其他工業國以至開發中國家，縱使不說是『依人成事』，也實際上無力擔負重任。我們先看美、日、德三國的困難所在，再進而探討，有什麼途徑可以使世界經濟脫離困境。

美國的經濟問題

美國的經濟，基本上是健康的。一九七七年的經濟成長率雖然達不到如所預定的五·七五%—六%，只達到四·九%，也已高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全體會員國的平均數三·五%。膨脹率維持六%。失業率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降為六·四%，一九七八年一月更降為六·三%。和其他工業國相比較，不為落後。

美國的困難只在於國際收支逆差過大。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曾經根據商業部資料，列舉國際收支各項數字及其總計，這個表對

註① "Dollar Plunges; Gold Reaches Three-year High,"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1, 1978.

註② "A Strategy for the Dollar," *Time*, Feb. 27, 1978, p. 50.

於分析美國收支逆差原因頗有用處，并列舉如下：

一九七七年國際收支之收項（單位：十億美元）

美國產品輸出	一一〇·四
外國訪問客在美國支出	七·三
外國人對美國規費、專利權和勞務的支付	一六·四
美國公司在外國投資的紅利和利息匯回	一五·一
美國個人在外國投資的紅利和利息匯回	一〇·五
美國售予外國的武器	七·四
總收入	一七七·一

一九七七年國際收支之付項（單位：十億美元）

外國產品輸入	一五一·八
美國旅客在國外支出	一〇·二
美國對外國人勞務的支付	一一·二
對於外國廠商在美國投資所獲紅利和利息的支付	一一·二
外國人持有美國證券所獲紅利和利息的支付	一一·二
美國在國外的軍事支出	一·一·二
對外援助	五·六
其他支出包括對居住外國人民的養老金等	二·九
總支付	二·一
	一九六·二

註：上二表不包括外國對美投資及美國對外投資。

從上列二表看出，一九七七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是一九一億美元；假使只計算貿易數字，則逆差是三一四億。貿易逆差的膨大，自然是由於輸入石油達四五〇億美元之多，賴以稍為抵銷赤字的是對外投資的利潤和武器輸出。這種事實可以作為後文討論的根據。

對於美國經濟問題的分析，似可採取美國不同立場的經濟專家的意見。時代週刊設有經濟學家會議，於二月下旬在曼哈坦開會。據報導，共同對於一系列的問題感到關切，那就是：長期的膨脹，利率的上升，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經濟活動的緩慢，能源短缺的威脅和政府管制的增加。

關於經濟擴展的問題。政府計算，投資年增加率需要保持七%才能够促進經濟的擴展，可是展望中一九七八年只得四·五%。企業對於新工廠和設備的支出為何遲緩？曾經擔任福特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葛林斯播（Alan Greenspan）說，不能認為企業的態度是不合理的，當你對於投資的環境沒有把握的時候，你不會把資金投入，好比一個人絕不會蒙着眼睛跑到馬路中間去。資料來源公司主持人艾克斯坦（Otto Eckstein）指出，企業從業者的小心不能認為「缺乏信心」，要認為是「企業的現實主義」。企業投資需要一定可期望的報酬。過去十年間，只要投資能够有一〇%的年利潤率就可以了，現在則必須有一二%，這是膨脹的結果。另一個原因是研究發展支出率的降低，在一九六〇年代佔國民生產毛額二%，現在降為一·五%，這由於企業家對於未來沒有把握，不肯多為研究計劃支付。期望利潤率的提高和研究發展支出的減少，也說明了，今天受聘的經理人員來管理公司比較怯於冒險，不如從前自營企業家有魄力。經濟學家們認為，這不是卡特總統的錯誤，因為這些困難在卡特就職以前就有的，假使福特在職，也許更為困難。

關於膨脹的問題。企業家們從來沒有遭遇過一九七三—七四年那樣兩位數字的膨脹率的震動。這是他們從前以為不可能的，竟然成為事實了，並且不能堅信其不再出現，雖然已經由一九七四年的一一%降為一九七七年的六%。芝加哥銀行家史伯林克（Beryl Sprinkel）擔憂會立即上升，一九七八年底可能達七%，一九七九年底達八%。雖然，有人認為這一預估偏於悲觀，但是，沒有人認為膨脹率可以即刻降低。共和黨籍的經濟學家歸謬於大量的預算赤字和聯邦準備制度的過度創造貨幣。民主黨籍的經濟學家雖然也擔憂卡特總統所提出一九七九年會計年度六百億美元的預算赤字，但是更重視工資和物價螺旋形上漲的動量。有人認為，即使六%的膨脹率也不是美國人所能適應的。詹森總統時期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歐肯（Arthur Okun）舉例說，許多公司在一九六〇年代建廠獲得大量銷售量，所以他們願意在擴展的市場中投資建廠。但是今天膨脹提高了建廠的成本，必須增加產品的價格一五%到二五%纔有利可圖。因為對大幅度加價的後果沒有把握，只有把擴展計劃束之高閣。

關於衰退的問題。葛洛夫（David Grove）認為，一九七八年的成長率，一般估計可達四·五%—五%，一九七九年只得二·七%。一九七七年的公司利潤增加率是九·七%，一九七八和七九也只能維持此數，理由是：勞動成本增加太多，生產力的提高無法予以抵銷。曾經在甘迺迪和詹森總統任內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赫勒爾（Walter Heller）則認為，需要的增加不够快，使新工廠難以獲利，這是阻礙投資最重要的原因。持續而強有力的市場是建立企業信心的最有效藥劑。企業家們不再像一九六〇年代那樣，可以盡售他們所建立新廠的產品。現在由於緊縮貨幣政策，使建廠的成本提高，更使企業家却步。

關於高利率的問題。銀行貸予企業的最高利率，在一九七七年初是六·二五%，一九七八年初增加到八%。史伯林克預料，今年內短期貸款利率將再漲一%。這樣使投資耗費更大因而延緩投資。其他經濟學家則認為，由於政府為彌補預算赤字，大量借入款項，使市場資金不足以因應企業的需要，因而使利率高漲，這對於建築業最為不利。歐肯指出，假使政府發行九十天國庫券的年率達七·五%，比現在的六·五高出一%，就會使建屋的開工數在一年內至少減少三分之一，招致經濟陷於衰退。

關於如何解除美國經濟的困境。有人認為一旦國會通過任何一種能源計劃，至少可以讓企業家們知道是怎樣一個政策。有人認為，通過卡特總統所提減低公司所得稅率由四八%到四四%，也足以鼓勵業者。有人認為，以密勒爾繼柏恩斯擔任聯邦準備監理會主席，可以減少白宮和聯邦準備監理會之間對於預算和利率政策的爭執。共和黨經濟學家也認為，假使能够在兩三年期間獲得穩定，也就是說，在膨脹率降低之下獲致成長，將可恢復企業的信心。企業從業者持有大量的擴展計劃，只是不敢付諸實施，只要條件適當，將樂於採取行動。^③

從美國經濟學家的討論會結論，可以獲得以下印象。(1)在兩三年內，美國經濟還無法克服基本困難，達到新的繁榮；(2)基本困難在於企業缺乏投資信心，消費者也缺乏消費信心；(3)高度膨脹和高利率之間發生矛盾，膨脹促使利率升高，高利率使投資的利潤邊際降低；(4)為降低失業率，提高總合需要，不能不採取赤字預算，而赤字預算有膨脹作用，也有提高利率的作用。總之，任何投劑都有副作用，決策者處兩難之境。對於損害美國經濟的兩大問題，討論會報告中未見提及，其一是大量貿易逆差，其二是煤礦工人七十幾天未獲解決的罷工行動。也許是出於致詞有所未便，所以避重而就輕，避招紛擾。

日本的苦經

美元跌價對世界經濟發生不利影響，而造成美元跌價的直接原因是美國長期的大量的貿易逆差。美國一九七七年的貿易逆差，單獨對日本即達八十億美元。此所以，美國要力謀改變對日貿易關係，一月十三日，美國貿易談判特別代表史特勞斯和日本國際經濟事務部長牛場信彥發表談判結果：減少逆差要逐年進行。

除貿易協定以外，日本接受美國的要求，將一九七九年的成長率定為七%，也就是說，要提高總合需要，俾能多輸入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商品。日本各界都不以為可以達此目標，認為只是政策性的決定而已。

日本因為獲得大量貿易順差，所以被課以「火車頭」的任務。事實上日本也是面臨重重困難。日本政府人員說，美國人看到日本聚積了大量的貿易盈餘，以為日本經濟很繁榮，殊不知，日本正面臨三十年來所未有的嚴重情勢。例如，二月十八日永大公司宣

註③ "A Realistic Lack of Confidence," Time, Feb. 27, 1978, pp. 48-49.

告破產，估計其所遺留債務達七五〇百萬美元以上。根據最近某銀行的調查，證券上市的公司，平均十家有一家已經實際上破產。這種情形使日本至少在短期間無法幫助其他國家從衰退中站起來。日本經濟相對的呆滯特別重要，因為，由於種種原因，其他兩個「火車頭」的作爲不像「火車頭」，倒像「守車」。日本經濟的滯緩不免將影響一月間和美所訂貿易協定的實施。

多數日本人認爲，達到七%的成長率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經濟研究機構估計一九七八年度的真實經濟成長率是四%——五%，例如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就估計爲四·四%。政府和民間經濟學家都說，除非消費者和公司增加支出，日本的經濟將繼續滯緩。爲了鼓勵私人支出，政府正增加公共支出，一九七九年度の支出預算達一、四四〇億美元，較一九七八年度實際支出增加二二〇億美元，也就是一九%強。其中，公共營建支出較一九七八年度增加三四·五%而達二二〇億美元左右。全部歲出之中，有三七%要由政府發行公債來支應。自從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這是第一次，政府發行公債額達歲出的三〇%以上。

私人經濟學家認爲，爲了達到七%的經濟成長率，還要減稅一〇〇億美元。一九七八年度減稅，按當期匯率計算是二七億美元，但大部份都進入消費者的儲蓄帳，而沒有用以購買。可處置所得的儲蓄比率達到二五%，這是在實施減稅時不可不知的日本民間消費特性。以美國相比較，其同類的儲蓄比率就只有八%。

就膨脹率和反衰退措施來說。膨脹率已趨平穩，一九七八年的躉集物價約略和一九七七年相同，至消費者物價的年增加率則將在五——六%之間。爲了加速經濟擴張，不能不稍稍犧牲穩定，一九七九年膨脹率料將略高。大藏省人員指出，目前工廠生產能量的運用率平均只有七〇%到七七%，失業率超過二%，在實施終身雇傭制的日本已經是過多了，久之，將會引起社會問題。企業的環境除了大信公司的例子和一九七七年有一八、〇〇〇家公司破產以外，一九七七年十月到一九七八年三月這半年間，製造業的利潤較前半年減少一·一%，非製造業則減少二·二%。除了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以外，日元升值也加重了企業的壓力，一九七七年間，日元對美元的匯率上升了二三%，除了石油公司以外，幾乎所有產業都受到打擊。許多企業，特別是出口定向的，在國外不得不提高售價而削減其競爭力，例如，豐田和日產兩大汽車公司，從一九七七年春季以來都提高美元定價達五次之多。

不過，儘管困難重重，日本的經濟還是強有力的。日本分析家說自由世界第二個最大的日本經濟假如能够應付當前的一些困難問題，那麼到一九八〇年可以出現好景。^④

德國的不同立場

近年來日本的國際收支順差雖然超過西德，但西德所積聚的外匯準備却比日本還多五〇%而超過三百億美元。一九七七年五月

註④ "The 7% Solution: Japan's Growth Lags, Cutting Hopes that it Can Aid Rest of World,"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2, 1978.

唐寧街七國高峯經濟會議中，西德總理施密特確定的聲明，當年的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五%，事後證明只得二·四%，還不到預期目標的一半。

美國政府為維護美元地位，原已和德國建立交換外匯準備的辦法，當美元匯率波動時，動用馬克外匯來收購美元。當二月中旬，美元匯率又告普遍下跌的時候，美國財政部長布魯門索訪問波昂，再度要求德國加速刺激經濟。在沒有得到德國的承諾以後，敏感的通貨貿易商認定，美國除了任憑美元匯率再度下降以外別無他途可尋，美元對馬克匯率因而立即下降。

布魯門索訪問施密特，攜有卡特致施氏的函件，對於他所提出一九七八年經濟成長率定為三·五%的目標表示接受。事實上，這一類的承諾僅為虛文。一九七七年五月七國高峯會議以後，施密特回到波昂以後，並不重視諾言，反而立即指示德國聯邦銀行緊縮貨幣供應量，政府也緊縮支出，並且極力促進輸出以謀解決失業問題。這樣使德國一九七七年的膨脹率僅達三·二%，除瑞士以外是工業國中最低的，乃使經濟成長率還沒有達到預定數的一半。

關於理論上的爭執。西德認為，迅速的成長足以招致高度膨脹的危機，而並不能如所理想的增加那麼多的進口。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研究的模式，德國政府假如增加支出等於國民生產毛額的一%，就可以創造足夠的進口，對歐洲、加拿大、甚至於對美國和日本都發生適當的助益。西德經濟部部長蘭道夫（Caunt Otto Lambsdorff）却說：「一個經濟不像機器那樣，當你把足夠的鑄幣投進去，就有所需要的東西放出來。」

美國政府人員也從政治方面來說服：假使西德加速擴張經濟，就可以幫助法國和義大利政府來回擊政治上的左派，因為可以幫助法、義減少失業人數。對於這個論點，施密特指為「過於天真」的觀念。施密特認為，在美國和德國，失業救濟和其他社會安全設施都大大的減少了失業者的艱苦。他舉出美國保守派的意見：對於當前的世界經濟，假使忽視膨脹，就會遭遇將來更嚴重的失業問題。

近來，德國的從政者、工會領袖或企業家，很少不同意施密特的觀點。主要反對黨的經濟發言人也說：「我們十分相信美國的政策是膨脹性的，是短視的。你們今年可以減少一些失業，但是在今年以後將招致膨脹，進而陷於衰退。你們不要成長這樣快，你們也不要再企圖使德國走上這條路。」

德國人認為，美元價值下跌，一般的經濟不穩定，其基本造因就是膨脹。蘭道夫說，「美元在全世界跌價招致新的不確定性，只要美元繼續萎弱，世界經濟的復蘇就繼續受威脅」。假使美國不採取步驟減低其膨脹率，德國人憂慮，石油輸出國可能提高油價，並且拋售以美元計值的資產，這樣將造成世界的貨幣危機，比過去的更為惡劣。這也不是危言聳聽，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導，按所可能得到的最近的資料，石油輸出國曾經在一九七七年第三季拋出十億美元。美國也曾顧慮及此，財長布魯門索曾經和沙烏地阿拉伯財長私人接觸，據表示，獲得沙烏地保證，不放棄美元的投資，並且也不考慮以其他支付工具代替美元賣出石油。

簡單的說，美國要求德國加速擴張經濟，而德國則反過來要求美國盡力抑制膨脹。可以說，道既不同，難相為謀。^⑤歐洲共同體九國財政部長於二月二十日在布魯塞爾開會，會後英國財相奚萊對記者說：各國部長同意，除非全體成員國採取共同行動，共同體不可能達到四%到四·五%的經濟成長率的目的。很少聽說要國際收支盈餘最多的德國作為各成員國的「火車頭」，雖然都承認德國可以比其他八國做得多些。當天擔任主席的丹麥財政部長赫克萊普（Per Haekkerup）另行招待記者說：歐洲共同體各成員國的行動範圍是各自不同的，如果爭持要一兩個國家負擔把其他成員國拖離困境的責任，那是過時的觀念。^⑥這項決定顯然是針對美國而發。

結論

從上述事實看，世界經濟復蘇的「火車頭」理論顯然已經觸礁。可以估計的局面將是各行其是。一個國家本來就具有自我中心的先天的特性。因為，執政者，不論是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都只是國家治權和政權的代理人而不是國家的所有者。暫時的或政策性的利他的自我犧牲，在個人是可以這樣做的；在一個家庭，家長也有相對的權力可以這樣做的；至於一個國家，不論執政者被喻為公僕或領導者，都只能為他們所代表的國民的利益而決策而行動，不能作自我犧牲的決定。因此，各謀其利和各行其是都是理所當然的。除非恰好是本國所需要，或基於形勢而不得不屈從，則舍己從人是執政者之大忌，誰都不願意這樣做。

對於「火車頭」理論，日本採取敷衍政策，德國堅決拒絕，都不足深怪，因為各站在其本國利益的立場。為解決當前的困難，就只有從共利的途徑去尋求對策。冷靜一下分析，似乎無可悲觀。

如在前言中所陳述。美元跌價由於美國貿易逆差太大，逆差擴大的原因之一是輸入石油達四五〇到五〇〇億美元，將近佔輸入的三分之一。卡特總統所提能源政策，國會可能在四月以前修正通過，只要能夠節約使用，增加國內產量，就可以減少進口。這一問題可以說，改善在望。

貿易逆差的第二個原因是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足。美元年來的貶值已經相對的提高其競爭力，當然還要美國能夠穩定物價，降低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並且增加研究發展的支出。

至於崔芬教授所建議，美國大量舉借強勢貨幣，在金融市場收回美元，也是治標可行之道，美國政府本來已經這樣做，不過崔芬的建議是更大規模的實施。美國的干預政策以打擊投機為目標，崔芬則認為，也可以減少國際金融市場美元流通過多的壓力。^⑦

註⑤ "A Big Engine That Won't", *Newsweek*, Feb. 27, 1978, pp. 33-34.

註⑥ "Bonn Locomotive Theory Won't Hold: EEC Execs", *Japan Times*, Feb. 22, 1978.

註⑦ 同註⑤資料。

以上的觀點似乎過於將責任加諸美國。事實上，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其機柄是操在美國之手，也只有美國纔能够真正擔負責任。進一步說，即使不為美元的地位着想，美國居自由世界領導者的地位，又怎能任憑工業生產力低落，消費的增加率超過生產的增加率？總結的說，美國治療了本身經濟的缺點，也就同時治療了美元的缺點。

當然，全世界經濟是一個整體。「火車頭」的理論假如已經「過時」，各國也就不能完全依賴美國，而必須羣策羣力，共同努力於增加投資，擴大生產，平抑物價，達成經濟均衡。尤其當美國處在需要調整改善經濟的時候，盟國必須約束對美國無秩序的輸出，並且盡量從美國購買商品和勞務，藉資緩和美國所受貿易逆差的壓力。支持美國也就是幫助自己，美元的穩定是自由世界每一國家所期待的，強有力的美國是自由世界安全、繁榮之所利賴。

中共簡化漢字之研究

本中心研究員汪學文所撰之「中共簡化漢字之研究」，係繼「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中山學術著作獎五十六年度得獎著作)之新著。其內容之重點，首在研究現階段中共對漢字之簡化，繼則將中共「漢字簡化方案」與日本「簡體漢字表」和韓國「漢文略字語彙」以及中共「簡化字總表」與新加坡「簡體字總表」，作比較研究；最後並對於我國文字應有之整理，以及光復大陸後之語文政策，提出己見，實為打擊中共企圖廢棄漢字及我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重要參考資料。

本書之撰著，作者曾以六十五年度個人研究計畫提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申請獎助，並經核准，特為附記。

全書六章，十五萬言廿五開本，二四〇頁，實售新台幣六十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